



靳辉明：新中国社会科学六十年回顾与反思

2009-11-27 10:58:47

来源： [人民网-理论频道](#)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风风雨雨中经历了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六十年，弹指一挥间。抚今追昔，共和国以其辉煌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投写了重重的一笔，她的伟大业绩，为中华民族这一东方古国的重新崛起，为在21世纪再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管曾经出现过怎样的曲折，当人们回忆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所创造的奇迹时，无不为之而自豪！与此而相伴随的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历尽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更是迅猛。它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推动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谈及新中国六十年所取得的光辉成绩，社会科学功不可没。今天，认真反思新中国社会科学六十年走过的道路，正确地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对于面临新世纪的社会科学开拓前进，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建国前的中国社会科学

谈论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不能也不应该不忘记旧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况和取得的进展，因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一种延续性，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割断历史，不是科学的态度。新中国的社会科学虽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它毕竟是从旧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而来的。

在建国前，我国社会科学的思想纷争，派别林立，但从性质上来讲，基本上两个方面：一是与半封建半殖民地和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相联系的旧的社会科学；二是“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新的社会科学。这两个方面，在某些领域都有所建树。而后者直接为新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奠立准备了充分条件。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千百年来都以灿烂的东方文明而著称于世。近百年来虽然落后了，但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优秀文化、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特别是文史哲方面，依然成绩斐然。20世纪上半叶，尽管处于长期战乱之中，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生活清苦，但仍然有大批科研成果问世，有些精湛之作迄今还在发生着它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发现了一大批震动中外学术界的珍贵史料，包括殷墟文字、敦煌和新疆的汉晋简牍、敦煌莫高窟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内阁大清的明清档案，以及考古学的其他发现，这为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个时期，在甲骨文、金文、青铜器铭文和古典文学，以及在商周史、秦汉史、隋唐史、西域民族史、边疆地方史和宗教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了一批像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和胡适这样的学术大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非常注重研究方法的探讨，甚至有的学者已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越来越多。

“五四”运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研究现实在，观察历史，重新思考一些学术问题。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稍后出版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行史纲》等，都是试图用唯物史观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著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是郭沫若，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这种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而得出的结论，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同时，中国学术理论界开展了一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各派学者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性质，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接着，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书中，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和剥削方式等方面阐明西周是封建社会，从而为西周封建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30、4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学领域，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在哲学领域，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理性与自由》、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等。此外，关于法国哲学思想家的著作和德国古典哲学著作，也开始翻译出版并向我国学术界进行介绍。在文学领域，“五四”新文学兴起，短短几十年间，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各种文学作品出版量尤其巨大。产生了像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夫、闻一多、田汉、夏衍、老舍、巴金、丁玲、曹禺等影响深远的文学大家。毛泽东称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在回顾建国前我国学术界理论发展时，决不能忘记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哲学社会科学所作的巨大贡献。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革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写出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理论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此外，还谱写了气势恢宏的诗词。这些著作，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其知识广博，思想精深，具有极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在建国前，我国社会科学、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它们是当时经济和政治的产物，又极大地作反作用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我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和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软弱无力，它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无所作为。只有“五四”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新文化、新的社会科学，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 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要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②这里，正确地阐述了“五四”后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形势及其在当时所起的革命作用。建国前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取得的重大成果，为新中国社会科学的奠立了准备思想材料，并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前提。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